

基層工作經驗彙輯

中華人民
國文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編

1956年1月31日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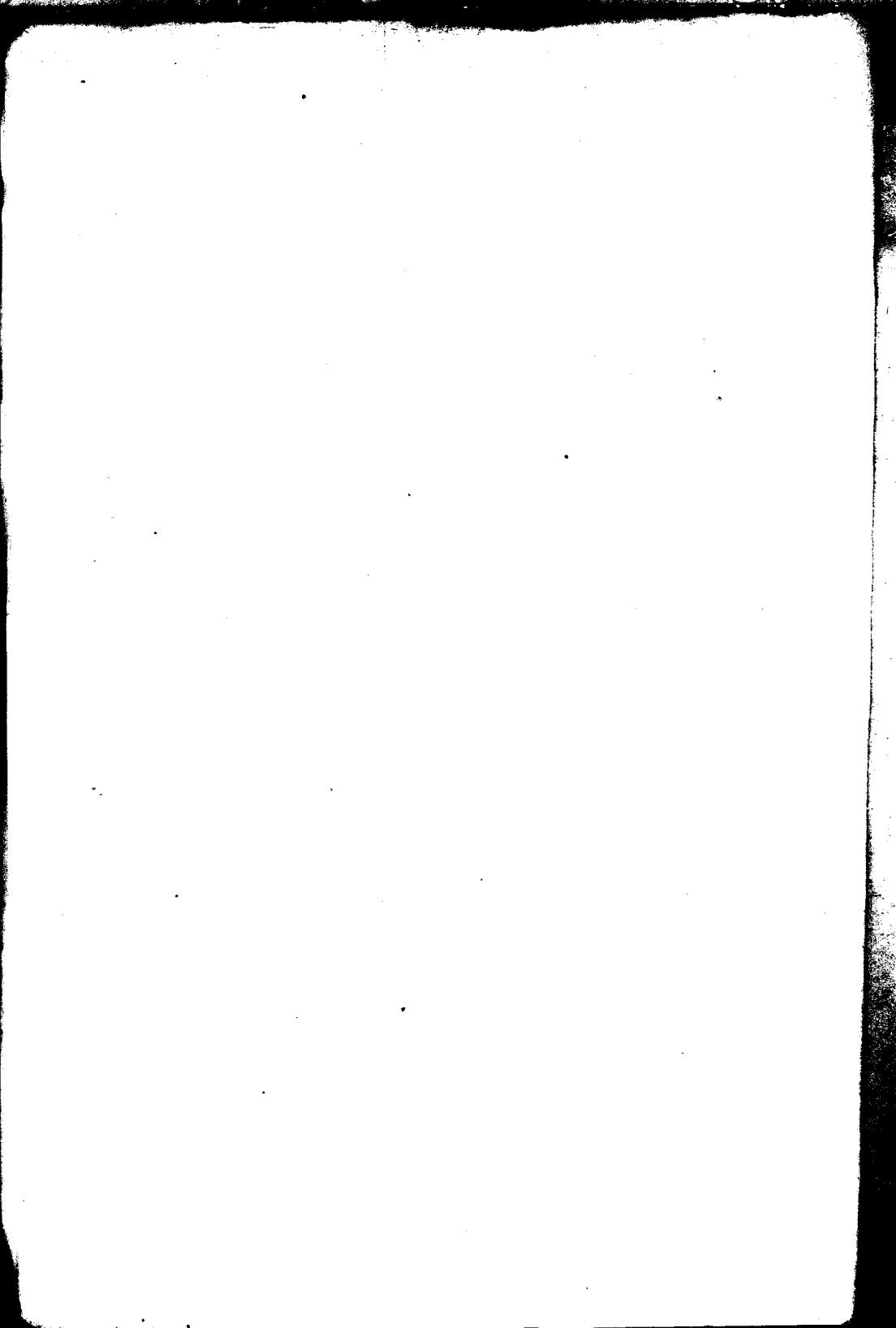
這個「基層工作經驗彙輯」包括九篇各地分社和基層組織有關基層工作經驗的總結。這些經驗都各有其特點，而且都是很寶貴的。各地分社和基層組織把這些經驗加以總結，說明我社對於基層工作是相當重視的。

應當肯定，我社在黨的領導下，幾年來做了不少工作；特別在發揮高級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方面，我們通過基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我國目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是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而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也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客觀形勢的急速發展已經對我社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相應地充實基層工作的內容、提高基層工作的質量，尤其在協助黨貫徹團結、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中，我們應當不斷地創造更多的經驗，幫助我社全體社員在學習和實踐中進一步改造自己，提高政治覺悟，努力做好崗位工作，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出更大的力量。

加強對基層工作的領導，作出基層工作的全面規劃和總結基層組織的工作經驗，是我社今後工作的重要一環。我們希望各地分社和基層組織抓緊我社工作的這個重要一環，在黨的領導下，為發揮我社社員及其所聯系的羣衆的一切潛在力量、完成高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一特定歷史任務而努力。

目 次

社帮助俞平伯同志初步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經過.....	3
我們是怎样領導基層工作的.....北京市分社師範大學支社	9
配合党政中心工作，發揮組織作用的点滴經驗.....上海分社交通大学支社	15
幫助陳鶴琴同志解決隊長負責制問題的經過.....南京分社	21
過好組織生活的初步体会.....南京分社師範學院支社	25
關於改進支社領導開展組織活動的几点体会.....重慶分社重慶大學支社	31
圍繞社員的崗位工作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几点体会.....	
.....重慶分社重慶建築工程學院支社	37
幫助汪秉全同志克服缺点搞好團結的初步報告.....	
.....西安分社西北農學院支社籌委會	43
我們對過好組織生活的体会.....西安分社西北工學院小組	51



社幫助俞平伯同志初步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經過

俞平伯同志是我國文藝界有名的老作家，是五四時期「新潮社」發起人之一，對我國古典文學特別是舊詩詞有相當研究，可是在學術研究上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治學態度與方法都深受胡適與周作人的影響，主張趣味主義，認為研究文藝是為了「鑒賞」「逢作戲」，為當時典型「京派文人」之一。但是他在政治上是愛國反蔣的。日本侵佔北京時期，周作人當了大漢奸，但他始終沒有參加敵偽的工作。日本投降後，他反對蔣匪幫的統治，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參加了九三學社。1947年著名的北京各大學十三教授聯名發表「維護人權」的宣言，他是簽名者之一。北京解放了，他的心情是高興的。他在學術上是嚴重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有濃厚的權威思想和驕傲自滿情緒，既缺少社會實踐，平日對政治學習也不够。對於別人的不同意見，往往難於接受。

（一）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開始後，俞平伯同志的表現和他的初步轉變

1954年4月，李希凡和藍翎同志發表了批判俞平伯同志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同年10月在全國範圍內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展開了批判，這對俞平伯同志來說，是事出意外，毫無精神準備。起初他不願接受這個批評，認為唯心論、唯物論的問題是吵不清的，他說：「說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唯心。」「曹雪芹不會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並列舉事實，說明「紅樓夢」在歷史上並沒有起過好的作用，而是起了壞的作用。不同意李、藍對紅樓夢的評價。批判進一步開展後，他的不滿和抵觸情緒也更大了。甚至閉門謝客，少出席會議。當時還有壞分子吳某去拉後腿，一方面寫文章批評他，一方面又向他表示是不

得已而爲之，很爲他抱不平，企圖激起他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挑撥他和別的批評者的關係。

全國性的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對他起了相當大的教育作用，作家協會與北大文學研究所對他進行了細緻的工作，向他指出毛是批判他的錯誤思想，而不是要打擊他個人，肯定他在政治上是好人，毛是和我們站在一邊的，並積極鼓勵他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尤其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露，使他更加認識到揭露並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重要性。其後，他到浙江農村中視察，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他注意到鄉村幹部刻苦努力的工作精神和農業生產的新氣象，並親睛看到農民對反革命分子的激烈鬥爭，從而提高了警惕。他在人民代表會上的發言，得到了代表們的熱烈鼓掌以及會外各方面所表示的重視和歡迎，使他很感動，他說：「思想改造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也很尖銳，受到批判的人不免痛苦，鬧情緒，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是這樣，不過我必須努力克服這種抵觸情緒，不然就有被反革命分子拉下水去的危險」。他說：「這兩個多月的視察和開會，對我幫助很大，比關上門讀幾年書還好」。又說：「我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體會到五年計劃就是階級鬥爭」。

由於黨的團結改造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由於各方面的大力幫助，九三學社也在黨領導下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幫助俞平伯同志初步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及所受到的唯心論的毒害，並在行動上有了初步轉變。

（二）社是如何幫助俞平伯同志初步轉變的

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後，社員們都關心這個問題，不少的人向社建議，要俞平伯同志來社作檢討。總分社負責同志在黨委領導下，研究了情況，認爲對他的幫助不能採取簡單急躁的方式，於是規劃了一系列的步驟。

甲、了解思想情況，解釋黨的政策，解除思想顧慮。在黨的領導下，總社與分社同志召開了多次的碰頭會，及時地掌握了他的思想情

況，一致認為他的抵觸情緒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為他不認識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重大意義~~。他認為這樣大張旗鼓地進行資產階級學術的思想批判是「小題大做」，是「搞得太過火了」；是「學術思想不自由」，甚至認為是「打擊人」。2. 怕學術上全部被否定，怕這次批判後一切都完了再也抬不起頭來了。3. 怕政治上被否定，被人誤解為政治問題，因此，不願與胡適、胡風相提並論。4. 懊心自己的前途。

5. 對某些不符事實的批評，如黃肅秋批判他壟斷孤本，他非常不滿。

根據以上的情況，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決定以沙灘支社為主，採取熱情關懷、朋友談心的方式和他保持經常的聯繫。社中央、分社的幾位負責同志也不斷地去看他。在他情緒最波動的兩三個月內，大體每週都有二、三人去看他，去時總是首先熱情關心他的生活、健康、睡眠等，介紹一些討論這個問題的情況，然後針對上述的幾個思想問題，在空氣和諧的漫談中很自然地反覆地向他說明：（1）他在政治上是接受黨的領導、贊成中國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和胡適不同，但學術思想和胡適一致，應該批判。（2）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不是打擊個人，而是批判錯誤的觀點。周揚同志說的：「批判俞平伯先生，當然祇是批判的錯誤觀點，而不是要打倒這個人」。這句話就成了我們對他進行說服工作的有力武器。（3）文藝報和它的負責人馮雪峯同志也受了批評，作了檢討，說明學術思想批評的大公無私，是對事不對人。他對這一點印象很深，對解決思想問題起了很大作用。（4）批判他的錯誤，也適當肯定他的成績，鼓勵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繼續作研究工作。對不符事實的批評，勸他不必介意，將來可以聲明更正。因而他對社的同志給他的幫助他非常感激，認為這是同志間的衷心關切，鼓舞了自己接受批評與繼續前進的勇氣。

乙、用交流體會和現身說法的方式，啟發他認識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危害性，並端正他對待批評的態度。

1954年11月上旬，他的情緒已逐漸穩定下來，並開始認識到自己的某些錯誤，他說：「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不是對付我個人，這是整個學術思想和文藝思想問題」。而且主動地在沙灘支社的會議上作檢

討，並要求同志們對他準備作的檢討文章進行幫助。

從此我們的工作重點轉移到配合有關單位幫助他作好檢討上面。

1954年11月21日他在沙灘支社小組會上作了第一次檢討，從立場、觀點、方法上檢查了自己的錯誤。他講完之後，社的許多同志都結合自我批評給俞平伯同志提了些意見。他的老朋友韓壽萱、孫雲鑄同志檢查了胡適思想對自己的毒害，陰法魯同志控訴了杜威、羅素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特別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傅魯同志的發言使他認識到自己學術思想的危害性，傅魯同志說：「我教了幾十年的書，在西安教過紅樓夢的課程，就是用俞平伯同志的『紅樓夢研究』作為資料，傳播了錯誤觀點，我讀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是參加了這次學術思想批判以後，才逐漸認識到紅樓夢的社會意義與歷史意義。」傅魯同志發言後，俞平伯同志感慨地說：「真沒有想到我的書危害了這麼多的人，我真對不起青年！」此外，汪鴻鼎同志還舉出瓦爾加接受批評，修正錯誤得到了蘇聯學術界好評的例子，來端正俞平伯同志對批評的態度，由於這些人與俞平伯同志年齡相若，經歷相似，因此他們提出的意見，就容易為他所接受。會後，俞平伯同志說：「這個會開得很好，對我很有幫助。」幾天以後，他到北大文學研究所作檢討，就吸收了這次會議的一些意見，充實了他的發言稿，而且也進一步端正了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

丙、在學術思想的問題上對他進行的幫助

當俞平伯同志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準備在報上公開檢討時，本社沙灘支社為了幫助他寫好書面檢討，先後開了三次支委會，對他提意見。一次討論了他的檢討提綱，一次討論了他的檢討的底稿，再一次對檢討中某幾個問題交換了意見，並鼓舞他繼續前進的勇氣。1955年1月，他寫完書面檢討的初稿。中央、分社宣傳、學習委員會又邀集了有關同志20餘人討論了他的初稿，對文章的寫法和內容都提了一些意見。大家要求他對他的文學觀點和他在紅樓夢研究中的某些基本觀點如：色空觀點，釵黛合一、怨而不怒、考據方法等作了比較深入的系統的批判。游國恩、金克木、樓邦彥等同志都對人物形

象問題、褒貶問題、怨而不怒問題、紅樓夢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問題等若干方面，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意見。但他在理論問題上還有些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只接受了一部分意見，對檢討稿作了局部的修正後，發表在1955年第3號的文藝報上。

丁、推動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在學術思想批判運動開展前，俞平伯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學習不够重視和積極，他錯誤地認為「校勘研究古典文學，可以不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他這次被批判後，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的負責同志多次鼓勵他看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書籍，說明他如果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將對研究工作有新的貢獻。廖可兌同志用自己學習的體會來說明研究古典文學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這些都啟發了他認識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

戊、幫助他做好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

1955年6、7月間俞平伯同志從浙江農村觀察回來，就參加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使他進一步受到了教育，為了鞏固他的收穫，我們着重幫助他做好大會上的發言。最初，他只準備表示擁護五年計劃和鎮壓反革命，由於同志們的建議、他才改為以思想改造為發言的中心內容。這次發言，實際上可說是他這次對思想改造的認識與態度的初步總結。9月初，他在本社慶祝抗日戰爭勝利10週年紀念大會上說：「學術上的唯心主義跟政治上贊成社會主義，是不能和平共處的，長此下去，用紅樓夢的話來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因此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對我有很大的幫助」。

(三) 俞平伯同志最近的情況

俞平伯同志已經沒有灰心失望的情緒了。他比較積極地要求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求思想改造，他正在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書籍，他在他的工作崗位上能爭取北大文學研究所黨委同志給他

具體的領導和幫助。工作也比從前主動、認真和積極了；他及時完成了紅樓夢的校勘工作，而且擬初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為紅樓夢的新校本寫序。他還提出了下一步研究李白的計劃和領導商量，現在領導上已決定三人合作研究李白的詩，以便在集體研究中通過工作繼續對他進行幫助。此外，表現得最突出的是他比過去虛心得多了，基本上克服了多年阻礙他進步的驕傲情緒，在不少問題上他都虛心地徵求別人意見，請教別人。

從俞平伯同志過去的經歷和思想改造過程來看，現在的情況表示了他有很大的轉變。自然這種轉變是初步的，還有待於進一步的努力和提高。我們計劃繼續幫助他鞏固收穫、加強學習，使他對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是怎樣領導基層工作的

北京市分社北京師範大學支社

幾年來，我們的支社從散漫到鞏固，從開不起會來到組織生活逐漸經常化，從抓不住工作到配合學校的中心任務為社的工作重心，從一步一步說一步到製訂每半年的工作計劃，從組織生活僅限於開會到會外的日常活動，從大家感覺民主黨派不起作用、“入社和不入社沒有分別”到在某些方面看見了組織的力量和成效，……這些變化，都是經歷了一段過程的。其所以能有這些變化，是由於上級社和師大黨政領導的正確，也由於社員同志們的自覺和努力；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支社委員會為了體現社在師範大學裏應完成的任務和應起的作用，在進行具體領導工作中一步步試探來的。因此，今天願意把我們初步的點滴經驗提出來談談，當然距離成熟還遠，更不成一個體系，也可能有錯誤的地方，談出來請大家批評指教！

第一，我們主要是按照社的方針任務，通過學校的各項中心工作，對社員進行思想教育——幾年來，我們不論在學習上、在工作上，一直是在師大的黨政和上級社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從未脫離師大黨政的統一計劃另搞一套，也從來沒有代替行政，使工作混淆，而是要求社能够按照師大發展的各個階段來保證工作的完成，也憑着這些保證來加強對社員的團結教育。在1952年，為了配合學校中的思想改造運動着手整頓我們的隊伍，通過學習文件和討論來提高大家對社的認識，端正社員對社的態度，明確社在學校中應起的作用，支社會經動員同志們在羣衆的幫助下認真地檢查自己的思想，同時也積極地幫助別人檢查思想。這樣，一面配合了學校的中心工作，又一面健全了自己的組織。後來學校由大的政治運動轉到面向教學，開始有些費力，我們也一度感到組織生活有些空虛。等到學校的黨政明確了教學改革必須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時候，我們就抓緊這一問題，組織社員

們一再討論向蘇聯學習的意義及蘇聯先進經驗的優越性；並且注重糾正同志們可能有的錯誤想法，這就為學習蘇聯作好準備。到大家有了些初步經驗或者感到些問題之後，再討論，這就能深入一步。為這一個問題，我們在半年內討論過四次。跟着這一總的前提來的是各系教學計劃的改革與執行、教研室工作計劃的製訂、教育實習的指導、科學研究的開展、助教的培養、宣傳辯證唯物主義和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學術思想的批判，……此外，還有新老團結、評定工資、……，在每一階段的每一工作開始之前，支社委員會都根據黨政的號召與佈置，着重解決社員及周圍羣衆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思想問題，通過座談、討論、分析、總結，得出正確的認識，使工作得到保證，使社員得到提高。同時由於我們組織生活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是從實際需要出發的，每次組織生活的方式也就跟着變化。例如：我們有時舉行支社的全體會作傳達報告，而後分小組談體會（如傳達周總理關於台灣問題的報告，關於麵粉統購統銷問題等），有時，先分組座談而後舉行全體會作總結（如對於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體會），有時指定某幾位同志報告從事某項工作的心得（如教育實習、科學研究等），有時打破原來小組的界限，按專題分組座談（如談培養助教問題時，年老的和年青的社員各為一組，從事行政領導工作的為一組），有時為了某一問題和民盟聯合舉行座談（如新老關係），有時採用聯歡方式在公園裏舉行（如院系調整前師大輔仁兩支社的聯歡），有時在飯館裏舉行（如新年聯歡），有時請其他支社的同志來作報告（如請金濤同志報告他突擊俄文的經驗），有時舉行茶話會（如歡送某同志被調往其他支社並互提意見），有時小組間互派同志參加彼此的小組會，交流經驗及學習心得（如學習憲法草案）；……這樣不固定的方式，既能適應問題的需要，也能增加同志們的興趣。更重要的一點是每次活動之前，必須明確要求，然後根據要求製訂討論的問題，假如一次解決不了，就接續兩次三次。預先佈置問題的好處是，大家可以早做準備，在討論時可以不離題，討論後可以明確問題究竟解決到什麼程度了。而問題都是根據工作的需要和同志以及社內外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

的，這就使大家感到有意義，因此有些同志們時常在會後感到滿意。我們在實踐的過程中，雖然認定思想問題不能急功，但也經常注意效果的大小和有無，這裏舉幾件配合學校工作的例子來看：教育實習是一件複雜的工作，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規模愈來愈大，內容愈來愈豐富，需要參加指導工作的人員也愈來愈多，不僅如是，工作的內容：如班主任工作、評議會、對中學生作個別了解等，都是新的，都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科學作根據。由於這些情況，我們先舉行支社會議，號召大家投入實習工作，認真學習這一新鮮事物，以貫徹在理論結合實際的原則下培養新型人民教師的要求，然後請有了初步經驗的同志作專題報告，供大家參考，這樣，我們絕大多數同志都陸續地參加了，並且在歷屆實習的總結會上有我們不少的同志受到表揚。去年，師大舉行教育實習經驗的報告會，領導上指派了兩位作報告的同志，都是本社社員，一位是王鈞衡同志報告“如何指導課堂教學”，又一位是郭晉華同志報告“如何指導班主任工作”，聽報告的教師們都感到有幫助，並且得到了師大領導上和蘇聯專家的好評（他們的報告已印出來）。另一個例子是：去年秋，學期開學後不久，中央教育部決定對師大的工作進行全面的檢查，目的在於總結經驗，解決問題，從而改進工作。對於這一項為期兩個月的檢查，我們認為支社必須配合並保證其順利完成。因此便主動的號召社員端正對於檢查工作的認識和態度，密切配合，積極參加，特別對負有領導責任的社員更需要積極推動工作，同時要求各小組把這一工作訂入計劃。在檢查開始後，曾召集一次支委與組長聯席會，聽取各小組關於這次工作的彙報，並交流工作經驗，各小組都按照支委會的要求，配合所在單位進行了一定的工作。例如：地理系小組在組內傳達並討論了這次檢查的目的和要求之後，小組長即與行政和黨的小組長取得聯繫，了解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研究社員應如何進行工作。他們感到有的社員對檢查的要求認識尚不够明確，只偏於注意檢查個人的思想，放鬆了對實際工作的經驗總結，因此在第二次會議上又結合實際工作着重的分析和討論了這次檢查的目的和要求，進一步貫徹了領導的意圖。當檢查到

教學內容時，小組長從黨政方面了解到他們系的工作還不够深入，便在第三次小組會上討論檢查工作中的問題，分析不能深入的原因，最後大家認為要深入首先必須從各個人的教學工作檢查作起，然後全系的工作才能展開。他們這種做法，對地理系的檢查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動和保證作用。

第二，一切工作要按計劃進行，並且為了貫徹計劃，必須有佈置、有檢查、有總結——我們在計劃的製訂上經過了兩個階段，起初是做一次訂一次，從1954年起能够在學期之初訂半年的了。在兩週一次的支委會議上，除間或討論個別問題之外，一般的不外乎聽取彙報、總結工作、製訂計劃、佈置工作等，可能每次會議的重點不同；但製訂計劃和佈置工作一定是在彙報和總結的基礎上；反轉來把計劃佈置下去之後，一定要有檢查、有彙報。這幾個環節緊密聯繫着，因而我們的計劃能堅持，能貫徹；並且支委會能掌握情況，在佈置新工作時有所根據，做到領導和羣衆相結合。但是這辦法有兩個大的缺點：一是雖然每次都有計劃，都規定這一次組織生活的要求內容與方法，究竟是走一步說一步，做過了這一次還料不到下一次幹什麼，因而有些工作就帶有偶然性，而不是系統的；又一是這辦法使各小組居於被動的地位，並且形成小組的依賴性。後來就由支委會在每學期之始，按照學校的工作計劃來試探着製訂支社半年的工作要項草案，徵得學校黨政的同意和聽取各小組長的意見後，作為正式決定，再由小組長帶到各小組討論後，即據以按照各小組所在單位的情況來製訂小組計劃。小組計劃由小組成員共同製訂，並且每次的內容要求和開會的時間、地點以及中心發言人或主要的準備人都在會上確定。然後由小組長帶到支委會討論批准後，各小組就按計劃進行工作。這樣做的好處是，能按照各小組的特點來進行工作，能配合所在單位的工作，能發揮各小組的積極性，能使各小組自動化；並且工作逐漸地有系統，能避免支委會領導工作的一般化，而且支委會可以根據各小組的計劃來檢查工作。我們在訂計劃的時候，都貫徹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的精神，上下聯繫的樞紐是小組長，這一點是計劃能行得通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發揮支委會的集體領導作用和培養小組長的骨幹作用——我們每年總結一次工作，並且在全體總結大會上改選支委會。歷屆支委的人數和人選都有改變，但都是團結的，合作的，發揮了集體領導精神的。這一點，在師大支社工作的開展與推動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起初為了緊密支委會和社員同志們的聯系，並且便於直接掌握各小組，就決定支委可兼小組長，這樣多數的支委兼小組長，支委會議也就差不多等於小組長會議，好處是上下通氣，沒有隔閡。後來感到兩個缺點，一是支委兼小組長工作太忙，又一是應當培養更多的骨幹分子，就決定支委一般不兼任小組長。（前後兩種辦法的小組長都是小組選出來的）。現在支委加小組長共十三人，有時舉行聯席會，有時單開支委會。每次開會都能和諧一致地取得決議。但是這不等於沒有矛盾，更不是支委就沒有缺點，我們支委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逐步展開的，常常為對某一問題的意見不同，展開討論和批評，也有時針對一個同志的缺點或錯誤進行批評。由於掌握了這一武器，造成了我們團結合作的真實基礎。在支委不兼小組長的情況下，我們規定分散在各小組的支委負責幫助和督促小組長。幫助是具體的，例如：在每次開會前，共同研究進行的程序和要求，可能產生的分歧，如何掌握會場，會後又共同研究收穫與缺點，還在平時和小組長研究個別同志的思想作風問題，以及如何進行幫助等等，這對小組長是有好處的。我們還要求各個小組長經常和所在單位的黨員負責同志保持聯繫，在每次會前研究工作需要，會後反映情況，還有時聯合本單位其他民主黨派共同研究。這樣就可以逐步提高小組長的骨幹作用。

第四，經常關心社員，並且依靠組織，幫助解決個別同志的問題——幾年來，時常有個別同志發生某種問題。例如：某同志某項工作中表現不夠積極，某同志不安心於本崗位工作，要求調動，某同志所領導的單位不夠團結……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都是通過小組先了解情況而後分析原因，派定專人（或支委、或小組長）從思想上進行幫助。有的經過一兩次個別談話就能解決；有的通過小組會運用批評和

自我批評，獲得思想認識的提高；有的須和某同志所在單位的黨或行政聯系共同研究解決，再讓某同志認識其所以錯誤；有的須照某同志的特點，找他所經常接近的社員幫助改進；……這些事都是集體中常有的，不能因其為個別而忽視。這些問題有的是學校領導上向支社提出，希望支社解決的，有的是社員自己向組織報告的，有的是羣衆輿論反映的，有的是支委或小組長了解到的，不管怎樣，都必須支社的領導重視這些問題，關心社員的生活和進步，才能够抓住問題，用心思解決問題。在幫助解決之後，他們感到組織溫暖，主動地更靠近組織，向組織報告自己的思想變化或補充說明具體情況等。還有突出的事例是，我們兩個老的社員陳兆衡同志和張雲波同志，都在解放後自動退了社，後來經過我們不斷地團結幫助，他們認識了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又自動申請恢復社籍，經總社批准，重新回到了社的懷抱。從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民主黨派除掉開會也還有不少工作要做，作領導的只有擔當起這些責任來，社員才需要社、信賴社、依靠社，而社才可以真正通過組織和社員表現民主黨派的具體作用。

配合黨政中心工作，發揮組織作用的點滴經驗

上海分社交通大學支社

交通大學支社於1953年春建立籌委會，1955年春正式成立，現有社員22人，分成三個小組。交大支社絕大部分社員都是老教授；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部分社員還擔任了行政領導工作。社員們在教學和行政工作上都負有相當重要責任，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對廣大師生特別是對老教授們有着重大的影響。二、三年來，我們支社在學校黨政和上海分社領導下，團結教育社員和聯系羣衆，積極參加黨政各項中心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發揮了黨的助手作用。因此，黨委對我們支社的工作感到滿意，社員也認為支社對他們有幫助，對社有了感情，社在羣衆中有了一定的威望。

我們支社怎樣在黨政中心工作中發揮助手作用呢？主要是加強並充實了我支社每二週一次的組織生活的領導與內容，把討論黨政各項中心工作作為我社經常組織生活的主要內容。

我們經常組織社員認真討論黨政中心工作，使社內成員思想明確，認識統一，從而發揮社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並帶動羣衆一道來完成黨政中心工作。從高等學校教師的工作日及教學工作量暫行辦法實施過程看，當1954年夏交大教務會議上傳達這一辦法草案後，由於社內社外都對辦法的精神實質缺乏全面的認識和了解，因而思想上存在一些問題，有些人片面強調要增加教師，忽視了我們教師缺乏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培養不够。他們認為過去要求增加教師，行政不答應，現在可以按照辦法規定的人數增加教師，不怕行政不答應了。有些人對政治學習不算工作量很有意見，他們說職員都是在工作時間內學習，當教授還不如當職員合算。也有些人對備課不算工作量而且又不能脫產備課一點思想上搞不通，認為工作量辦法中日的標準過高，規格過嚴，怕吃不消沒有信心執行。還有些人認為採取大班講課後，要妨礙助教進